

方志学视野下的晚清中外台湾游记*

——兼论近代台湾地方话语权的再建构

卞 梁 连晨曦

提 要: 方志和游记的概念及内涵历来有所区别。我国台湾地区因开发时间晚、赴台手段少等特殊原因,模糊了台湾方志与游记间的界限,甚至还赋予清代台湾游记“类方志”的内涵。阐释晚清时期台湾游记与方志在体例及内容上的共通之处,并通过对外中台湾游记中地貌风物、先住民^①生活等方面的解读与比较,分别梳理两者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发展脉络及形成特点,尝试从方志学的视角剖析两者在争夺近代台湾地区话语权的过程中所展现的中西文化差异,能拓展我国台湾方志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 方志学 中外台湾游记 晚清 话语权

方志自古便是历史书写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晋之乘,楚之桡机,鲁之春秋”(《孟子·离娄》)始,绵延两千余年。清代章学诚曾言: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之体而作志,仿律令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②可见方志一般具备志、掌故、文征三要素,而游记一般需要地物、游踪、情感(或理念)。从概念上分析,游记三要素与方志三要素之间有差异却相互关联:对地物的描述是志的重要部分,游踪则是掌故所要清晰描述的内容之一,文征亦能表现作者丰富的情感。因此,游记才会被冠以“类方志”^③的别称。晚清台湾地区局势纷繁复杂、变化多端,传统的方志编纂受到极大挑战,同时清廷派驻的官兵及赴台西方人士的增多使晚清台湾游记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通过对游记的种种解读,一定程度上能够还原地方志记载缺失的表述,同时能使后人得以了解近代台湾地方话语权的分散与整合过程。

1840年后,随着中国的国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台湾和我国其他省份一样,不得不接受当时西强东弱的世界格局,进而开始艰辛曲折的近代化进程。1895年日本侵台是台湾近代史上的转折点,也是台湾游记全面衰落的起点。一方面清廷开

* 本文由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妈祖文化在‘海丝’沿线国家传播交流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7BH155)、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琉球归属与东亚国际秩序嬗变研究”(项目编号:18YJC770017)、福建省教育厅中青年教育科研项目“福建海外移民与中琉妈祖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JAS180420)联合支持。

① 对于台湾早期住民的称呼,历来说法颇多。中国台湾及日本学界长期沿用“原住民”或“原住民族”这一说法。本文为表尊重,在引用台湾学人的著作或译著时均沿用原作之称谓。在阐述自身观点时则使用“先住民”一词。一是使用“先住民”的称谓符合我国一贯以来的相关方针与要求;二是目前“先住民”的概念在两岸均得到了认可和使用。

② 参见张树棻纂辑、朱士嘉校订:《章实斋方志论文集》,山东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3年,第6页。

③ 台湾学者黄美玲最早提出“类方志”的概念。她认为游记便是“利用方志的包容性展现其在台见闻,并以方志的外貌让文本具有更大的公信力,以供后来者参考”的一种类似方志的著作。参见黄美玲:《明清时期台湾游记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12年,第29页。

始丧失对台湾地区的管辖权，中文游记迅速减少；另一方面日本对在台西方人采取严格的人身管控措施，西文游记亦快速绝迹。因此，1840—1895年间所著台湾游记，不仅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且记录了台湾近代社会变迁的过程，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一 晚清中文台湾游记的发展与转型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清廷对台的控制力开始衰退。淡水庭事曹士桂^①所著《宦海日记》清晰记录了这一过程。首先记述的是台地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五条港（今云林麦寮海丰港）是鹿港因淤塞而另外通航的台中部重要港口，当时“鹿港口门淤浅，商舟不前，道光四年采舆论，请开五条港利商船”^②。然而短短20年亦面临尽失繁华的危险：

舟子□□□□□□之顺而速，而入口之早争一刻也。盖近岸十数里□□□，大舟不能达岸，故开港道以入之。口，港道也，如是舟亦海船之中下耳，然已入水八尺，非十有二尺水不行。且沿海岸皆铁线沙也，遇木深入，再触沙数次辄坏，似水中石堤然。^③

可见，持续近百年之久的“一府、二鹿、三艋舺”盛景在当时已不复存在。一方面是因为1850年前后欧洲货轮大量出现在东南亚一带，西洋船的大吨位、大吃水量对台湾地区港口提出新的要求，鹿港一带只能被迫转型为轻型帆船集散地。同时，又因清廷为鼓励台湾对外贸易，开设淡水、基隆、打狗、安平四地为通商口岸，这也宣告以鹿港为代表的台中港口的集体没落。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趋于缓慢，台湾的社会矛盾亦日益增多。先住民治理问题日益突出的同时，“番割”^④间的斗争亦逐渐加剧，尤其是两大番割李秀和洪璠因争夺当地垦番权所引发的大规模械斗，给当地社会治安及稳定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

秀尝犯大辟罪，二十四年分类案，即因秀与洪璠争垦外国姓大平林地肇衅。秀数因其番妇招生番出而抢劫数次，毙数十人，系枭首不足蔽辜者。璠则家大平林下曠屯园，两家相距二十里。分类案璠为首恶，皆以所居近番地，严缉未获。史梅叔以两人皆凶悍，素通番亦足制番，请于上宪宥其罪，用为招抚生番使，私赏顶戴，且云把总职，加六品衔，以意为之，不避干犯也。^⑤

然而，官府对这样的一起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的事件竟采取“宥其罪”并“私赏顶戴”的奖励措施。同时，对于普通汉人偷垦，官府的惩戒措施却十分严厉，如当时“社西有今春私人入汉

① 曹士桂（1800—1848），字丹年，云南文山人。道光二年（1822）举人，在台先后任鹿港同知、淡水庭事，病逝于任上。

② 姚莹撰，云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编：《东槎纪略》，“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第24页。

③ 曹士桂撰，云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编：《宦海日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60页。

④ “番割”在一些文献中也被称为“土生仔”，指那些娶先住民女人为妻的汉人，他们通晓“番语”，在先住民与汉人间均有较大影响力。

⑤ 曹士桂撰，云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编：《宦海日记校注》，第173页。

民二十余人，屋数椽，私垦地数十亩，种旱稻”，官府立刻采取措施：“奸民也，新来未久，不可不逐。命毁其屋，芟其稻，捕其人，逃矣！”^① 此类事件在当时中文版台湾游记中常有记述，不仅反映出清政府治台政策已无法满足当地社会发展的需要，也说明当时清政府对先住民居住地的实际掌控力已大大减弱。

同时，这种对台湾社会不同族群间的区别对待，一度成为晚清台湾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源，这些都被曹士桂以游记的方式记录下来。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清政府当时对先住民聚居区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汉人借由对所谓“番地”的开垦开发，不仅显著提高了台湾南部的社会生产效率，而且加速了与当地先住民的融合过程，这已成为当时台湾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

社仔社近在山口，汉奸私垦已多；埔社自受害后，引熟番以自固。二十余年来，丁户渐繁，私垦亦复不少。今一旦强以升科纳租，自非所愿……现在移居湄社之番已数十家，官召之佃数十户，且道路已开，□□拟此辈或于谋焉。^②

康熙六十年（1721）蓝鼎元考察此地时，只见先住民“浮田种稻”“家藏美酒”并“挟弓矢射鱼，须臾盈筐”^③，较少出现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特征。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曹士桂眼中的景象则已是“内附改熟，投诚真挚，嗷嗷待哺，开垦则给租授食，一切官为□护，尚可长其子孙”^④。通过比较发现，先住民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改变，行为也进一步汉化，部分族群（如平埔族等）已完全汉化。这是台湾社会变革的重要例证。

这一时期的游记除了关注台湾的社会变化外，还积极考察台湾的防务情况，这是由晚清台湾严峻的海防局势所决定的——丁绍仪^⑤所著《东瀛识略》便是其中的典型。客观上看，该书更接近方志的范畴而非游记。《东瀛识略》分8卷：卷1为建制、疆域，卷2为粮课、税饷，卷3为学校、习尚，卷4为营制、屯隘，卷5为海防、物产，卷6为番社、番俗，卷7为奇异、兵燹，仅有最后的第8卷所记为遗闻及外记。在该书中，作者根据自身对当时台湾海防海备情况的理解，对台湾的军事防备提出了很多建议。

丁绍仪首先建议将军事港口向北迁移。他认为，由于“盖安平昔为要隘，近年鹿耳、鲲身悉被淤，海舶到台，非泊百里外之国寨港”，因此需要放弃中南部港口，使船“泊凤山县之旗后口，似毋庸重兵坐守矣”^⑥。除此之外，与大陆保持紧密联系也是其考虑的因素之一，“沪尾距福州海口最近，风利则朝发夕至，信息易通。控制全台似无有要于此者”^⑦。丁绍仪还通过记载台湾地区建城的历史强调在台筑城的重要性：“初，府厅县皆未建城。雍正初，请建未果。乾隆中，始立炮台、树城门，栽蒴竹或九芎树为卫。民间庄堡亦有环植蒴竹且筑銃楼以自固者。逮嘉庆、道光间，乃次第筑砖石城。惜土松，又易震，未有数十年不倾圮者。”尤其是澎湖、葛玛

① 曹士桂撰，云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编：《宦海日记校注》，第204页。

② 曹士桂撰，云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编：《宦海日记校注》，第233页。

③ 蓝鼎元：《东征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7年，第86页。

④ 曹士桂撰，云南省文物普查办公室编：《宦海日记校注》，第234页。

⑤ 丁绍仪，生卒年不详，字杏舲，江苏无锡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因公事滞台。

⑥ 丁绍仪：《东瀛识略》，“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2年，第5页。

⑦ 丁绍仪：《东瀛识略》，第6页。

兰、凤山等地，由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并未建城，这让丁绍仪十分担忧：“今惟澎湖厅无城，葛玛兰厅与凤山县所治埤头尚未改建。”^①

而在军队人员建设方面，丁绍仪的观点则略有偏颇。他认为台湾居民大多重利好名，因此不可大用：

台民性慕浮荣，得一职衔例贡，必颜其楣。如访有孝子、悌弟、顺孙、节妇及乡里共推善人者，分别请旌给匾；准其制为钦旌特褒某项衔牌、婚丧等事，列于头踏之前，其人见官长免行跪礼，用彰殊宠。小民见此，无有不争相夸羨者。^②

这无疑清初“台湾自红彝僭窃以来，因仍草昧……逋逃之渊藪，五方所杂处，未尽同风而易俗”^③ 偏见思想的延续。有趣的是，丁绍仪提出的解决之法，竟是重用澎湖士兵。他通过对比澎台两地民众的特性，认为澎湖人个性淳朴安分，较易管教：“台民悍、澎民懦；台民奢侈、澎民贫苦。作奸犯科、不数年辄蠢动者，皆台民，澎民无有也。”^④ 这也是历史上最早对澎湖人性格特征的描述。

可见，《东瀛识略》的部分内容不仅远超游记的记叙范围，更是方志中地理志、军事志不具备的。此类著作大多数陈时弊，大有劝诫之意，但均从利于清政府在台统治出发，处处可见其良苦用心。如对于“台民易乱”的现象，丁绍仪将其归结于清朝官员的贪污苛政：

台湾为海外严疆，定制文武官胥由内地调往，非夙著循良卓卓有声者不得预其选。洵如是数百年可期无事。何以数年、数十年变乱频仍欤？故老传言，朱一贵之起，由知府王珍任意苛敛，淫刑以逞；林爽文之变，由知府孙景燧始则因循弥缝，继则轻率妄动；张丙之反，由知县邵用之贪渎偏执，知府吕志恒不恤民隐。^⑤

丁之所以提及“任意苛敛”“不恤民隐”，目的是告诫宦台官员洁身自好、体恤民情。由此判断，晚清时台湾游记的概念已经随着时局的变化而悄然改变，已逐渐具备总结执政经验的官方谏言书性质。

与此同时，该时期台湾游记与方志一样，将对台湾先住民的考察列为重点。如丁绍仪借由职务之便，首次对全台先住民族群情况进行考察，为光绪十一年（1885）后刘铭传全面开展“抚番”工作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综计全台熟番一百二十八社，归化番二百三十七社，未化野番可知者八十九社……今每社男妇少者二三十名，多则百余名、二三百名，最多至四百余名，无不另分新社者……百余年来，自生自灭于重峦叠嶂间、有社名存而番已易者，有番是而社名非者，且有土人占耕其

① 丁绍仪：《东瀛识略》，第11页。

② 丁绍仪：《东瀛识略》，第37页。

③ 蒋毓英著、陈碧笙校注：《台湾府志》，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4页。

④ 丁绍仪：《东瀛识略》，第45页。

⑤ 丁绍仪：《东瀛识略》，第92页。

地仍冒社番名者。^①

总而言之,《东瀛识略》是晚清为数不多的中文游记中的经典之作,不仅在文学上获得了“文笔精炼、见解透彻、文采斐然”^②的评价,在方志学上亦突破传统纪、志、图、表、书、传并用的体例编写,以游记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字载体将晚清台湾百姓的生活现状真实记录下来,且数陈时弊,大有劝诫之意。这与近代来台西人所著游记中那种反抗官府统治的记载是完全不同的。

二 近代旅台西方人游记中的方志要素

自1864年西方基督教^③传教士时隔200年后再次踏上台湾土地,中西文化的摩擦与融合便随着台湾的历史发展延续至今。而从1864年开始至1895年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这30余年是西方人来台人数的快速增长时期。尤其是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的签订,不仅规定“教士随处可以传教,不得禁阻”,且“华民以后不得滋扰洋教士”“倘有中外交涉之事,宜先禀明中外官府,不得私自滋闹”^④。这就取消了西方人传教的地域限制,同时为其人身安全提供必要的保障。“传教士的利益受到了当地政府的保护,台湾社会的不满情绪立刻沉寂了。”^⑤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人纷纷前往台湾:1860年,英国长老教会传教士杜嘉德携马雅各考察淡水及艋舺^⑥;1865年,马雅各带助手(陈子路、黄嘉智、吴文水)赴台^⑦,拉开了西方人大规模来台的序幕。这也使得西方人撰写台湾游记进入发展黄金期。

西方人对台湾的风物地貌做了详尽的考察。马偕^⑧可以说是对近代台湾影响最大的西方人。他将当时的西方文明带入台湾北部,创建了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并延续至今。同时,其所著《福尔摩沙记事》是晚清西文版台湾游记的典型代表。在该书中,马偕详细记录了台湾澎湖地区花瓶屿、棉花屿、彭佳屿3个岛屿的风貌,这对一名西方人而言是十分难得的:

这些岛离鸡笼约一百多里,属于台湾,但都是自治的。花瓶屿是个不规则的秃岩,上面没有长任何植物,也没有动物可以在那里生存。这岛高出水面有一百七十尺……棉花屿也不适合人类的长期居住,但却是个让海鸟飞来栖息的好地方……岛的一边有一座垂直而起的粗糙岩石,约两百尺高,有个坡度慢慢下降到海边,形成约有二三英亩大的平顺岛面……彭佳

① 丁绍仪:《东瀛识略》,第70页。

② 黄美玲:《明清时期台湾游记研究》,第320页。

③ 基督教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基督教指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新教,狭义则专指基督新教。本文所指基督教均为基督新教。

④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教务教案档》第2辑第3卷,1974年,第1353页。

⑤ W. Campbell, *An Account of Missionary Success in the Island of Formosa, Vol. 1*, London: Trübner&Co., 1889, p. 218.

⑥ 参见徐谦明、郑连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台湾教会公报社,2000年,第6页。

⑦ 参见徐谦明、郑连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百年史》,第7页。

⑧ 马偕(George L. Mackay, 1844—1901),加拿大长老教会传教士,在台传教40年,兴办学校、医院、教堂等超200个。

屿比上述两个岛屿都大得多，凸出海面有五百四十尺高，岛面约有十英亩大，有一百多个来自鸡笼的汉人住在那里……在一个比石屋还高的地方，我看到了一座很久的炮台，像在苏格兰的撒德兰郡早时匹克特人所遗留下来的炮台一样。^①

法国侵台士兵简^②则从战略的角度概括 1885 年澎湖地区的情况：

那是一座介于台湾海峡间的群岛，由三个大岛组成：澎湖、白沙和渔翁，以及二十多个多少少都有人居住的小岛。最后是为数众多的珊瑚礁围着中央各岛，形成一条带状，这些都是天然的小堡垒，很适合防御工作。^③

对于台湾本岛，考察则更为细致。如史帝瑞从台湾的名字入手来理解台湾：“也许是台湾岛上肥沃的平原和茂密的山林，与海峡对岸中国东南沿海群岛那些光秃秃的岩石山丘显得如此不同，才让他们不禁叫出‘福尔摩沙’。”^④ 马偕甚至还从地质学角度对台湾进行分析，详尽程度令人咋舌：

台湾是大陆岛屿，约在第三纪时，因和大陆中间的陆地下陷，和中国大陆分离。类似的下陷，也发生在中国沿海各地。从勘察加半岛的南端开始，接着千岛群岛、日本、琉球、菲律宾、婆罗洲、爪哇及苏门答腊，形成亚洲大陆的东边界限。而台湾则居于此环线的中央位置。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中国海及台湾海峡，它们掩盖着陷于底下的陆地。台湾和大陆之间，仍然由一个陷下的地盘相连，地盘最深处为一百寻。^⑤ 但在岛屿东方三十里的海外，用测锤所探测出来的深度则达一千寻，而再远一点则达二千寻、三千寻、四千寻，直到太平洋未探测过的深黑之处。^⑥

1864 年，马雅各^⑦从打狗抵达台湾，开始了他在南部山区的医疗传教工作。3 年后，李庠^⑧来台协助其开展活动。李庠在台期间多次走访台南及台东地区，著游记数篇，大多收录在《教

① 马偕著，林晚生译，郑仰恩校注：《福尔摩沙记事：马偕台湾回忆录》，台北前卫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 年，第 174—175 页。

② 简 (Jean L.)，生卒年不详，1884 年作为见习水手随法军舰船侵略台湾，所留日记已被翻译出版。

③ Jean L. 著，郑顺德译：《孤拔元帅的小水手》，《台湾史料丛刊》(6)，台湾“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2009 年，第 112 页。

④ Joseph Beal Steere 著，林弘宜译，李壬癸校注：《福尔摩沙及其住民：19 世纪美国博物学家的台湾调查笔记》，台北前卫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 年，第 3 页。

⑤ 英寻 (fathoms) 为英制单位，1 英寻为 1.8 米。

⑥ 马偕著，林晚生译，郑仰恩校注：《福尔摩沙记事：马偕台湾回忆录》，第 39 页。

⑦ 马雅各 (Dr. James L. Maxwell, 1836—1921)，19 世纪中后期在台南部活动的医生兼传教士，创设台湾首座西式医院。

⑧ 李庠 (Rev. Hugh Ritchie, 1834—1879)，英国长老教会牧师，1867 年代替海上遇难的马逊牧师 (Rev. David Masson) 来台协助马雅各，是该教会派遣来台的首位牧师。

务杂志》^①上，成为晚清台湾东南部游记的典型。借助李麻的记叙，19世纪中后期的台东海岸美景得以再现，这也是西文中有关台东海岸最早的记述：

经过漫长的一天我才得以到达东海岸。我只能站在平底帆船的甲板上，听着海浪的咆哮，欣赏来自于北太平洋的浪花。岸边是各式的天然海港，北面有个四五英寻深的海塘，底部都是淤泥……台东的六英里海岸线多样而有趣，一些地方离海非常近。

台东地区的丰富物产也让李麻陶醉其中，他发现：这里鸟类众多，随处可见画眉、云雀等，亦盛产小麦、小米、芝麻、土豆及烟草，北边的森林里到处是樟脑树，时常能发现麋鹿、野猪甚至猎豹、灰熊等生物的踪迹。沿海的山峰苍翠欲滴，一些圆丘上常覆盖着一米多长的茂盛野草，为这片土地涂抹上了斑斓的色彩。^②

西方人游记对于某些物产的描述甚至比方志还要详尽。如李麻不仅描述了槟榔的外观和颜色，还将当地人的用法作了记录：“槟榔不仅被用来食用，而且常见于各类祭祀场合，每当男人们外出狩猎前，他们都会撬开一颗槟榔，将红色的汁液涂抹在手上，以期向上帝祈祷，寻求神的帮助和庇护。”^③

首先，需要警醒的是，虽然如此详细地对台地理描述客观上能够有效增进西方人对台湾的了解，马偕也承认“台湾是大陆岛屿”这一事实，但是考虑到当时西方在东亚地区推行的殖民主义政策，将其与西方国家的对台情报搜集工作联系起来亦不足为奇。

其次，西方人对先住民有着多元的评价。如马偕认为南部先住民除了历史悠久似乎毫无人性可言，他们“放荡不羁，在荒野丛林里以英勇的耐力悠游穿梭，不屑于文明的甜美，过一天算一天，若所期盼欲求的受到阻碍时就视为灾难”。当然，他也不否认台湾先住民的悠久历史，“没有人知道这些皮肤黝黑的马来族人已经在这些山上狩猎鹿及山猪有多少个世纪了，而历史记录最远也只能追溯到一千年前，但在这之前他们就已经在这岛上了”^④。尤其是其中的“猎人头”令他感到十分惧怕：“台湾的生番最热爱的是猎取人头，这也是他们被控诉的一项暴力罪行。他们自幼到衰老都只热衷于这一件事，从不感厌倦，也绝不会动恻隐之心。”^⑤而这种野蛮的行径却是当地住民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一猎到人头，生番们就会尽快回自己的村子，仍在山顶上尚未到达村子，就高声发出胜利的狂叫，等候的村人一听到这声音就会派一群人到村外迎接这些勇士并护驾他们回来。”^⑥

① 《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是19—20世纪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中持续时间最长者。此刊物创办之目的是为来华西方人提供一个交流信息的平台，以协助彼此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交流工作的推行。杂志涵盖的主题十分多元化，主要探讨当时西方人在华的相关迫切问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②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 6,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5, p. 206.

③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 6,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5, p. 208.

④ 马偕著，林晚生译，郑仰恩校注：《福尔摩沙记事：马偕台湾回忆录》，第243页。

⑤ 马偕著，林晚生译，郑仰恩校注：《福尔摩沙记事：马偕台湾回忆录》，第258页。

⑥ 马偕著，林晚生译，郑仰恩校注：《福尔摩沙记事：马偕台湾回忆录》，第263页。

但是，必麒麟的观点则与马偕相异。在他看来，先住民不仅“不具攻击性，是单纯质朴的民族”^①，而且他“不认为台湾原住民是食人族。即使有上述那种行为，汉人也不能蔑视原住民，而自视中国文明高尚”^②。他还认为先住民有着诸多的优点，如“山区原住民以部落形态群居。他们所居住的房子用石头建造，屋顶也是石板瓦，外观十分洁净；也有若干部落用竹子茅草和泥土建造房子”^③。对人也较为友善，“原住民通常对外国人很友善。如果送一些肥皂、小珠子、红布、钢制器具或小镜子，他们会十分感激”^④。这与马偕的观点有着较大的区别，但这似乎仅仅是必麒麟与先住民关系较为密切所致。

与此同时，西方人眼中的先住民形象较之清朝宦台官员有着较大的不同。西方人常抱以矛盾的心态来审视先住民的生活状况。一方面，因长期历史问题，西方人与先住民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这个“祸根”早在200年前便已埋下。17世纪荷兰殖民者将枪炮指向台湾先住民，妄图使其屈服，结果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不仅形成了“这里的人毫无基督教的认识，只是徒有虚名”^⑤的消极传教局面，且大肆搜刮民脂民膏，“通过榨取可怜的台湾人，抢夺其仅有的狩猎收入而养肥了自己”^⑥，之后便“一直盘算着回国后享受舒适的生活，他们要求尽早解除他们的职务以便尽快脱身”^⑦。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私、贪婪、残忍”便成为台湾人民对在台西方人的首要印象。以至于200年后的赴台西方人仍难以摆脱“西来禽兽”之名，矛盾与伤害便无可避免了。另一方面，西方人对先住民往往抱有同情心。他们认为台湾先住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因汉人来台而遭到破坏，因此被迫迁往山地居住。如必麒麟认为“汉人利用他们的弱点，以租用土地为借口，事实上是强占了那些土地。当平埔族人向官方提出控告，往往被拒之不理”^⑧。试图将先住民的“不幸”归责于汉人。实际上，这与基督新教追求在先住民族群中宣教的便利性不无关系，必麒麟的观点便能很好地佐证。他一边赞颂先住民，认为“台湾的原住民大都是谦和良善的”，另一边则将基督教在先住民中宣教的失败说成是汉人的影响：“拜访过彰化到南岬间约二十个山地原住民部落后，我相信，如果荷兰人能继续统治台湾，今日全岛岛民都会开化，并且成为基督教徒了。汉人心中那份自大的优越感，把平埔族人和山地原住民当作孩童或禽兽看待，结果惹来这些原住民的怨恨。”^⑨

这种矛盾心理使得西方人在惧怕之余，又积极探求和记录先住民的生活状态。如马偕记录下了当地先住民的生活景象，这是中文游记及方志中极为缺乏的宝贵资料。首先是部落酋长的起居室：“酋长的房子是一间有三十尺长的大房间，夜里两端各有一个火堆，男人都站在一个火堆周围，妇女就蹲在另一个火堆旁。”马偕认为这些人虽然无知，但充满着人性的善良：“房间对边的长椅上躺着一位生番母亲和她刚出生在睡觉的婴孩……男人们边吸

① 必麒麟著，陈逸君译述：《历险福尔摩沙：回忆在满大人、海盗与“猎头番”间的激荡岁月》，台北前卫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第93页。

② 必麒麟著，陈逸君译述：《历险福尔摩沙：回忆在满大人、海盗与“猎头番”间的激荡岁月》，第96页。

③ 必麒麟著，陈逸君译述：《历险福尔摩沙：回忆在满大人、海盗与“猎头番”间的激荡岁月》，第97页。

④ 必麒麟著，陈逸君译述：《历险福尔摩沙：回忆在满大人、海盗与“猎头番”间的激荡岁月》，第97页。

⑤ W.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Co. LTD. 1903. p. 211.

⑥ W.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Co. LTD. 1903. p. 274.

⑦ W. Campbell,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Co. LTD. 1903. p. 279.

⑧ 必麒麟著，陈逸君译述：《历险福尔摩沙：回忆在满大人、海盗与“猎头番”间的激荡岁月》，第93页。

⑨ 必麒麟著，陈逸君译述：《历险福尔摩沙：回忆在满大人、海盗与“猎头番”间的激荡岁月》，第105页。

烟边说故事和讨论着狩猎，以及不久将到边界的出征。妇女们则忙着在多轴纺织机上纺纱，并边绕苧麻线边谈笑或互相揶揄。”^①李麻对南部地区先住民日常生活的描述与马偕较为相近：

王座是一张四脚的板凳，临近灶台，位于一层的中央位置。其他地方则铺满了凉席给族人在白天休息，有些人甚至晚上也睡在那。当然对于女性而言，居所更为私密。普通族民的居住条件则更为简陋，他们的房屋大多数用竹竿和干草堆砌，大约有四十英尺高，仅有几张鹿皮装饰着地板和床铺，墙上还挂着鹿角和野兽的骷髅。小棚屋两侧的山形墙上有一扇门，窗户在前方，所以在潮湿炎热的季节，屋内无法及时通风。部落的房屋非常密集，大大小小的房屋远看像蜂巢一样，人们常常挤在没有门窗的室内的火堆旁抱团取暖，烟雾弥漫，空气污浊。这导致了疾病的肆意横行。^②

总体而言，西方人因其教育背景、知识结构的不同，对先住民有着复杂多元的评价。虽然由于自身视野及立场所限，在记叙方面存在管中窥豹、断章取义的现象，但他们所记也有一定的客观性，在很多方面弥补了晚清方志记载的不足，具备地理志、风俗志的基本要素。同时，部分西方人对台湾的真挚情感也是不可否认的。如马偕曾说：“遥远的福尔摩沙是我所挚爱的地方，在那里我曾度过最精华的岁月，那里也是我生活关注的中心。望着岛上巍峨的高峰、深峻的山谷及海边的波涛，我心旷神怡……即使赔上生命千次，我也甘心乐意。”^③然而近年来，马偕在台湾地区的地位不断升高，被誉为“一个比台湾人更爱台湾的‘正港台湾人’”^④，甚至被形容为拥有“史上熠熠千古的伟大心灵”^⑤。这样的评价难免有矫枉过正之嫌。另外，由于西方人群体的复杂性，部分别有企图的西方人确实对台湾图谋不轨，妄加臆断，这也是事实。

这种南北先住民在生活上的一致，说明台湾14个先住民群体^⑥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也从侧面印证了近代西方人游记一定的客观性。值得反思的是，同时期的中文游记及方志对先住民日常生活的描述却几近于无，这显然不是先住民地区难以进入所造成的。既然西方人尚且能得以进入，作为地方统治者的汉人没有理由丧失前往该地考察的权力。可能由于对台湾先住民文化的轻视和反感，汉族士人们错失了解当地民情的绝好机会，甚是可惜。

而西方人因大多肩负着传教的任务，如李麻在他游历台东期间多次深入平埔族居住地传教。他认为“平埔族人乐于聆听福音，白天各自进行祈祷，晚上则聚集在一起祷告直到深夜”^⑦。这

① 马偕著，林晚生译，郑仰恩校注：《福尔摩沙记事：马偕台湾回忆录》，第255页。

②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 6*,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5, p. 207.

③ 马偕：《福尔摩沙记事：马偕台湾回忆录》，第356页。

④ 马偕：《福尔摩沙记事：马偕台湾回忆录》，第355页。

⑤ 马偕：《福尔摩沙记事：马偕台湾回忆录》，第1页。

⑥ 根据台湾2007年的统计，台高山地区现存先住民为阿美人、排湾人、泰雅人、布农人、太鲁阁人、鲁凯人、卑南人、撒奇莱雅人、赛德克人、邹人、赛夏人、雅美人、葛玛兰人、邵人。参见叶兴建：《台湾高山族》，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2页。

⑦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 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6, p. 167.

令他十分兴奋，感慨“这是近代来台西人由‘被钉在十字架上’向‘受人尊崇’的角色转变”^①。也正因此，近代西方人在先住民地区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在宗教方面。到1870年，已经“有近50个家庭皈依了基督教……每个家庭都渴望拥有一本赞美诗……相信这里所有的皈依家庭每天都会进行早晚祈祷”^②。所有西方人对此均很乐观。

对于在台汉人，西方人也给予足够的关注。1876年春，打狗教区的康纳牧师深入汉人族群进行考察和了解，展现了西方人视角下汉人在台的生活状况。他沿着凤山旁的溪流而下，立刻就被一个汉人小镇所吸引。小镇周围的土地都被改造成了梯田用来灌溉和耕种，用于灌溉的水被一层层积蓄起来。为了防止洪水的突然入侵，村民们细心挖掘了多条宽阔的沟渠以供排水，两侧都是坚硬的岩石，或者是用木钉固定的竹排。康纳被人们辛勤的劳动所吸引：“一辆辆手推车上装满了木材或是甘蔗，它们通常由一头大水牛和一头小牛拖动……这里听不见四轮马车或者火车的声音……中国人很懂得欣赏音乐，他们工作时常常哼着小曲。”^③可知当时迁居台南的汉族同胞已将东南沿海先进的水利设施建造技术带到台湾，生产方式也以农耕为主，除了在作物方面盛产甘蔗糖类，其他与大陆几无差异。

必麒麟、马偕等对台湾东北部的记录和描述，以及李庠、康纳等在台东、台南的旅行游记，较为全面系统地构建出19世纪下半叶的“台湾印象”。不仅是对近代台湾地区风物地貌、人口社群记载的补充和完善，也是西方人“他者形象”的集中展现，这种基于“东方主义”^④而产生的西方中心观，在西文游记中多有体现。

三 方志学思维下的近代台湾话语权再审视

方志历经千年，虽体例不断完备，却“一夸饰而古迹人物辗转附会，一攀附而琐屑之事迹、庸沓之诗文相连而登”^⑤，在系统性、专门性和深刻性上有所欠缺，而游记则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这些。在这其中，中西游记就如何表述“台湾”这个概念时各自有着不同的理解，这是由于西方人坚信“话语即权力”^⑥，谁能对台湾进行更符合自身需求的解释，谁就拥有了台湾的主导权。因此，为争夺台湾话语权而展开博弈便是西方人的必然选择。这种理解的不同，一方面是19世纪西方世界殖民主义赤裸裸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近代中国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

① Rev. Justus Doolittle,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3 (1870. 6 - 1871. 5), 1871, Foochow: Rzarior Marcal&Co, 1871. p. 167.

② *The English Presbyterian Messenger*, August, 1870, p. 186.

③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 7,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6, p. 118.

④ 有关东方主义理论的代表性阐述见于萨义德的代表作《东方学》。他提出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世界是没有真实根据、凭空想象出来的东方，因此对该地的人们及文化存在着强烈的偏见，亦为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提供了借口。参见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

⑤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修订本，第45页。

⑥ “话语即权力”是当代法国哲学家、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法兰西学院的就职讲座上提出的，即“话语同时也是争夺的对象，历史不厌其烦地教诲我们，话语并不是转化成语言的斗争或统治系统，它就是人们斗争的手段和目的，话语是权力，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力”，这也是对西方世界殖民主义思潮的极好总结。

首先,清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台湾的战略地位。清政府收复台湾后,一度对台湾的“去留”展开过激烈的交锋和讨论,最终康熙作出英明决策。他认为“台湾弃取,所关甚大”,还制定了“镇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当之策。若徙其人民,又恐失所;弃而不守,尤为不可”^①等加强台湾防御的政策。但从中亦不难看出,当时收归台湾的主要目的是“恐人民失所且弃之不可”,而并没有将台湾的发展作为考量中心。但是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海洋文明及其所带来的海洋霸权行为^②使得清政府认识到了台湾的重要战略地位:“闽洋紧要之区,以厦门、台湾为最,而台湾尤为该夷歆羡之地。”^③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各国列强对台湾的觊觎和侵略不断加强,尤其是日本,吞并台湾的企图已到路人皆知的程度。明治时期日本文部大臣井上毅曾向伊藤博文进言:

世人皆知朝鲜主权之必可争,而不知台湾占领之最可争,何哉?……占有台湾可扼及黄海、朝鲜海、日本海之航权而开闢东洋之门户,况台湾与冲绳及八重山群岛相联,一臂所伸,可制他人之出入。若此一大岛落入他人之手,我冲绳诸岛亦受鼾睡之妨,利害之相方,不啻霄壤。^④

因此,清廷在处理台湾问题时,不断强调两岸与生俱来的关系及官方统治权的正统性。中文游记不仅在体例、形式、内容等方面与大陆游记高度一致,强调汉人“勤劳勇敢、通情达理”的形象,以建构起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的官方话语权。而与之相反,近代赴台西方人面对的则是基本的生存需求及繁重的来台使命,同时在台时间亦受到多种客观因素的限制。为了确保自身安全以便开展更多活动,他们对台湾中下层百姓采取拉拢政策,并刻意放大官府与百姓间的矛盾,以此获得“夹缝”中的生存空间。这其中的典型便是白水溪教案,这是“第一个以乡绅为首的反洋教运动”^⑤,呈现出台湾乡绅反教的新形势。当时随着传教的不断深入,甘为霖决定在嘉义白水溪设立台湾中部的第一个宣教点,但遭到了住民的激烈抵抗:“为霖在嘉传教,从者少。至店仔口庄,庄豪吴志高族人夜袭之。为霖逃,伏从莽中,数日始归府治。”^⑥而在甘为霖自己的描述中,则将自己刻画为基督教义的忠实拥护者,同时将教案发起者吴志高说成是“恶名昭彰的人物”:

吴志高是个恶名昭彰的人物,行为猖狂,无法无天,在过去几年带给当地官府极大的困扰和焦虑。他透过各式的迫害、诈欺手段,据说现在已累积了丰厚的财产。他广大的居所位于店仔口外围……这些房子全被坚固的竹栅栏围绕起来,竹栅栏四周则布有大量武装的随

① “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清圣祖实录选辑》,“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6年,第131页。

② 海洋霸权行为即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称霸世界及独占海洋资源,通过剥夺其他国家领海权互相展开竞争的国家行为。参见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民族解放运动教研室编:《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史(1945—1978)》,内部教材,1980年,第497页。

③ 齐思和:《清朝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1,中华书局,2014年,第373页。

④ 转引自黄大绶:《台湾史纲》,台北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82年,第196页。

⑤ 林金水:《台湾基督教史》,九州出版社,2007年,第155页。

⑥ 连横:《台湾通史》卷22《宗教志》,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43页。

从，随时处在防备官兵或民众攻击的状态。^①

上述描述显然有悖事实^②，正是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在无意间“制造”了这一难以弥合的误解。而在教案发生后，当地官府的态度也让甘为霖大为恼火，因此他试图将此事件描述为当地官民合力打压西方人的“政治事件”。马雅各也对台湾官府的行为妄加论断：“汉族来台移民对白水溪一带进行着残酷统治……一些当地居民在我们的影响下成为了基督教徒，之后他们开始对当地暴政感到忿忿不平，声称要取缔当地统治者的非法权利。”^③西方人将台湾社会的诸多问题归结于中国地方官的无能，有意识地挑唆台湾先住民，鼓动其反对清政府的统治，并将其归结于皈依基督教后精神层面的“重新发现”。然而这一番言论却与台湾的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事实上台湾地方官员对白水溪教案的处理极其迅速，以“开为吸烟……非有心之过”^④为由，启备银150元以赔偿教堂损失，且在该案中据理力争，维护台湾人民的尊严，这显然与残酷暴政相去甚远。

这种潜意识中的西方中心意识使得西文游记在记叙时极其强调台湾的独立性，不论是地貌、动植物，还是人文风情，均被用来与其欧洲母国进行比较，丝毫未涉及两岸间的密切联系。这样的游记，似乎少了几分客观，多了几分政治色彩，让人不禁觉得遗憾。

结 语

晚清时期（1895年前）的中外游记，各具特点却相互关联。中文游记正统权威的叙事方式、军事海防为主的考察内容、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文化理念均体现出清廷对台湾战略地位的高度认同。西文游记则深受兰克史学^⑤的影响，以西方一贯的写实主义风格细致入微地展现台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尤其注重对先住民的考察。但西方游记多受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政治色彩较浓，叙述往往不够客观。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莆田学院妈祖文化研究院）
本文责编：詹利萍

① 参见甘为霖著，林弘宜、许雅琦、陈珮馨译：《素描福尔摩沙：甘为霖台湾笔记》，台北前卫出版社有限公司，2009年，第86页。

② 吴志高为人正直、诚恳，并重视教育。他在同治六年（1868）还和乡绅林威一起，重建台南玉山书院，为当地百姓提供文化教育。

③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ume 6,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75, p. 155.

④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清季教务教案档》第3辑第3卷，1977年，第1442页。

⑤ 兰克史学是由19世纪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所创建，强调重视原始资料的利用和考辨，对当时整个欧洲的文风有很大影响。